慈禧坐汽車軼事

許　揚

人與事

北京目前汽車保有量已達五百萬輛，在爲人們出行帶來方便的同時，也讓這個城市變成內地的「首堵」之城。許多人甚至質疑北京的汽車發展令這個城市變得沒有了古都的風韻。

汽車之於北京不過是一百多年的歷史，而且是最先出現在宮廷中。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六十六歲壽辰時，直隸總督袁世凱特地進口一輛汽車，作爲壽禮敬獻給慈禧。據說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輛眞正的汽車。

坐慣了轎子、馬車的慈禧在紫禁城太和殿檢閱了貢品。當她聽說這輛洋車不要馬拉就能跑，感到很奇怪，立即口諭在場的德國司機開車。德國司機踩響馬達，洋車眞的轟隆隆地跑了起來，慈禧看了喜不自禁，高興地問：「這車跑得這麼快，要吃許多草吧？」德國司機說：「它不吃草，燒的是油。」慈禧吩咐太監李蓮英端出珠寶，賞賜了袁世凱和開車的洋司機。

慈禧乘車去頤和園遊覽，駛出紫禁城後，她突然發現，「車夫」不僅坐着，竟然還敢坐在前面，與自己平起平坐。立即責令「車夫」跪下。慈禧的話是聖旨，司機只好跪着駕駛。手不能代替腳去踩油門兒和駕車，路上險些釀成大禍。這可嚇壞了當時的王公大臣，紛紛下跪，乞求慈禧不要冒這個險。無奈，慈禧被人攙扶下車，中途還是換上她的十六抬大轎。

與上述「齊東野語」不同，慈禧御前女官裕容齡在所著《清宮瑣記》中記述：慈禧因爲開車的司機要坐在她前面，所以未曾乘坐過。《北京志・汽車工業志》則云：「因司機無法按慈禧的『聖諭』跪着駕駛，慈禧不願『屈尊』乘坐。」而《北京志・頤和園志》記載：「該汽車因長期存放，早已損壞。不只引擎早已不能發動，且前車燈、方向盤丟失，皮坐墊及車篷頂已破爛不堪。」直到「文化大革命」後，頤和園將老態龍鍾的御用汽車整修，在德和園陳列，供遊人參觀。

對這輛花了一萬兩白銀購進的汽車的「身份」，至今還有爭議。有人認爲它是第二代賓士牌小轎車，也就是德國生產的。《北京志・汽車工業志》中記述：「北京第一輛汽車是……德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產品，式樣幾近歐洲十八世紀的馬車，功率約為四馬力，時速十五公里至二十公里。」《北京志・頤和園志》也有類似記載：在一九七六年，德國賓士汽車公司的三位工程師來到頤和園，看到這輛車，確認爲是一八九九年該公司生產的第二代「賓士」，並願意用十輛新車換走這輛汽車。另有說法，認爲這輛汽車是美國生產的，交通部高級工程師王華鵬認爲：應是美國圖利亞牌汽車。「圖利亞」是美國人圖利亞兄弟，他們從一八九三年開始設計製造汽車。

《海洋》詩刊

許定銘

書醉亭

余玉書在《西窗隨想錄》卷二《台大四年記》的《四年一覺詩人夢》中，談到他與同學們創辦「海洋詩社」，及出版《海洋》詩刊的經過。知道《海洋》詩刊創刊於一九五七年五月，覃子豪、張秀亞、白萩和彭捷等也來稿支持。他們在《代發刊詞》中展示了這群年輕詩人的心聲：

在文學史上我們可以知道，海洋文學有着光榮的里程碑。海洋詩刊是意味着跨過重洋，我們要發現詩的處女地，探勒層的礦苗，墾殖荒野的叢林……

余玉書說由他主持的《海洋》出過二十期就交棒了。此刊其後共出九年，傳統是由在台大就讀的「僑生」主持編務的。如今大家見到出版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的第六卷第三期，就是香港的黃德偉（靖笙）作總編的。他後來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香港大學。這期《海洋》是三十二開本，僅十六頁，以詩創作爲主，理論爲次，有翱翱、淡瑩、王潤華、葉曼沙……等人的作品。而這期《海洋》也是最後一期獨立出版，之後的，就附於《台大僑生》內，寄人籬下了。余玉書是《海洋》的創辦人，一九六〇年代畢業回港後，雖然任職銀行界，仍努力寫作，兼任《文藝線》及《香港時報》副刊編輯，據說後來移居溫哥華，如今是七十多歲的古稀了。

跨越「幸福陷阱」

純　上

燈下集

幸福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嗎？怎麼才能獲得幸福？美國作家拉斯哈里斯（Russ Harris）撰寫《幸福陷阱》（The Happiness Trap）一書，聲稱要讓讀者學會「減輕壓力，戰勝畏懼，創造有意義的生活」。他的方法是簡稱爲「行動」（ACT）的最新心理治療模式：即，接受（Accept）和負責（Commit）療法（Therapy）。

哈里斯說，世上不幸福、不快樂的人何其多。根據統計，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成年人被診斷心理失調；世界衛生組織宣告憂鬱症是目前世界第四大最昂貴、最折磨身心的疾病，到了二〇二〇年會上升爲第二名；每周都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憂鬱症，五分之一的人一生某個時期罹患此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一生的某個階段會酗酒、吸毒上癮。

那麼究竟什麼是幸福？究其根源，幸福的意思有二：一是「愉快的感覺」，二是「充實、豐富的生活」。哈里斯認爲人們不快樂，歸根結底是對於幸福的認識謬以千里，結果造成惡性循環，越不快樂，越掙扎；越掙扎，越不快樂。他的解釋是：幾十萬年的進化發展，讓人類的頭腦養成了兩種生存本能：一方面要時刻警惕，預計危險，做最壞的打算；另一方面生存的需要決定了個人必須合群，所以頭腦不時把自我和別人比較。這些進化的痕迹在現代生活中的影響，就是個人傾向於悲觀思考，總在內心自我貶低。遇到困難和挑戰時自我感覺緊張、焦慮非常正常，可是假如誤會人生來就該幸福，如果不快樂一定是自己有問題，並且試圖強行壓制負面情緒，那當然會越來越憂鬱。

而「行動」療法的六大準則，其實就是幫助我們擺脫這種思維定式，培養一種健康的「心理靈活性」。其中包括：解扣、擴展、聯繫、自我觀察、價值觀和負責的行動幾個環節。哈里斯首先設計了一些測驗讓讀者自我評估，然後建議策略，幫助大家去除執念。比方說，如果遇到困難時自我否定，他建議我們先認可這種想法：「我現在說自己是個大廢物」，然後試圖爲這個想法配音，用搞笑的動畫片人物的嗓音發言，配上滑稽的畫面、音樂和字幕。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意識到這個想法只是想法，並非事實，不用信以爲眞。不過，他強調，這種「解扣」攻略的最終目的不是驅趕負面意念，而是讓我們自我反省、冷靜觀察，不爲它們左右。隨之而來的「接受」，也不是忍辱負重，忍氣吞聲，而是認識到現實的局限，然後站穩腳跟，想辦法戰勝挫折。

接受之後就要行動。哈里斯建議，每個人都要明確自己的價值觀：即，自己最重視的基本東西是什麼，然後確立短期、中期、長期目標以及相關的小步驟，有條不紊，穩步前進。如有挫折，也不必氣餒，而是要評估、設想可行的方案，繼續努力。

哈利斯本書的實用之處，在於他不但提供理論解釋，還設計了實際的行動策略。例如，讓讀者深呼吸、閉目冥想、想像圖形、仔細觀察，宗旨是要專心致志（mindful）、活在當下。書中有句話說得實在，「人的感情就像天氣現象，它們永遠存在而且時刻變化」。我們能做的就是提高自省能力，不要自動啓動「掙扎」的按鈕，而是：觀察、呼吸、隨它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感情糾結、過分期待、逃避困難、和行事與自身價值觀南轅北轍的情況，跨越「幸福陷阱」。

別樣風情堪培拉

倪　蔚

域外漫筆

一年前，因工作需要，我曾到澳洲首都堪培拉短暫生活了幾個月。這並非我首次出國，自青年時代起，我就走過很多地方，從非洲小國到美洲大國，從東非之角到荷里活，可惜彼時年輕瘋狂，風景人事在我眼裡更像初春一陣波動的風，飄過即逝，並無留下特別深刻印象，更別說記下一點可作未來回憶的文字。

這次短期公幹堪培拉，我的感受卻很不同。或許是人到中年，我漸漸喜歡凡事放慢一步，耐心品味思索，於是拿起筆斷斷續續記錄了這個別樣風情的南半球一角。

氣候怪異難琢磨

到達堪培拉時，正是初秋。澳洲雖地緣遼闊，擁有迷人的黃金海岸及海港城市珀斯等，但首都堪培拉地處內陸，氣候異常乾燥。好在間中時常下雨，偶然還夾雜點冰雹，才不至於那麼難受。此地溫差甚大，早晨出門通常得穿薄毛衣，到十點左右，太陽一出來，就熱到像夏天，恨不得穿短袖衫。傍晚時分，太陽一落山，天氣即刻轉涼，長袖襯衣可上身。而到了夜間，那必須得穿上薄毛衣或外套，否則很容易着涼感冒。我一位住在美國加州的朋友聽說後，告訴我這倒和加州的初秋氣候頗爲相似，早晚透心涼，中午又很熱。說實話，這氣候讓初來乍到之人，還眞不好琢磨和適應。

待到深秋初冬之交，就更加怪異了。白天溫度可達十六度左右，但一到夜晚，很可能降至一度甚至零下一、二度，陰冷陰冷。澳洲推崇低碳生活，沒有集中供暖之說。沒有辦法，我只好去住地附近的商店David Jones買了電熱毯，晚上開着它，再加上房子前主人留下的電暖器片，才算熬過這令人難受的寒冷夜晚。

澳洲老翁心存遺憾

在漸漸適應堪培拉變化多端的氣候的同時，我也開始關注這個城市的人，無論異族還是同胞。

一個周末，我去市中心購物，偶遇一希臘裔澳洲男子。或許是我那獨特的唐裝吸引了他，他主動熱情和我打招呼，不斷地想和我聊點什麼。原來，幾年前他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了一個上海女子，女子面目姣好，主動表示要和他相處。每次到他家，便手腳不停幫他收拾屋子，非常勤快能幹。女子用有限的英文，不斷表達要嫁給他，他也曾動心。我說那不是很好嗎，就把女子娶回家吧。他卻接着說：你知道嗎？我們澳洲希臘人對中國來的女子，特別是上海女子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她們只看重錢財和澳洲身份。

我告訴他人和人是不一樣的，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標籤中國女人或上海女人。也許你認識的上海女子眞是個不錯的伴侶。他又不斷表達說他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但他們年齡相差太大了，當年上海女子才四十歲左右，他說她應該找個年齡相仿的男子結婚，這樣對她公平點。如果他們相差二十歲，他恐怕眞會娶她爲妻，也會在死後留些財產給她。我問他今年貴庚？答曰：八十一歲。

看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筆挺的身板，一隻手握着以巴爬犁，另一隻手拿了個Pizza，我眞不敢相信眼前是個八十一歲的老人。

「既然身體這麼好，爲什麼至今仍單身？」我好奇地問。

他說原配是希臘裔澳洲人，多年前中風癱瘓在家，不久就去世了。我問他的婚姻觀，他說如果有來世，一定還娶希臘人。因爲希臘女人的優點就是幫助自己的男人成功，無論男人做什麼事業。

我笑笑說那我們這兩個民族有着共同點啊，我們中國的女人也這樣啊。

聽我說完這句話，他面露遺憾地站在那裡，沉默了。不知他是否在爲曾經的那段愛情自責？看他離去的孤獨背影，我搖搖頭：如果不是那點私心和對中國女人的偏見，此時他或許正幸福地與她一起逛街，或喝着咖啡，或在庭院中享受兩人世界……他的生活本可以是另一番風景。

上海新娘機智幽默

堪培拉的華人圈子中，流傳着這樣一個眞實故事。一上海姑娘來此地後，結識了一個澳洲男子，兩人準備拉埋天窗做夫妻。女方家人要求回上海大辦婚禮。因澳洲男人有過一段婚姻，前妻是黑人，離異後兩個子女歸他撫養，孩子都還未成年，此次婚禮只得帶上他們一起來上海。婚禮進行中，兩個完全遺傳了媽媽膚色的黑孩子見到爸爸，不停地喊「Dad，Dad」參加婚禮的上海親戚朋友們不無驚訝地看着這一幕：哪裡冒出來兩個小黑人？

上海新娘卻處驚不變，機靈地拿過主持人手中的話筒，用濃重的上海話解釋着：噢喲，我老公啊，是個慈善家。格兩個小囡是孤兒，是我老公在澳洲收養格。賓客們聽後，紛紛起身，舉起酒杯，向這位慈悲的澳洲老公表達敬意。回到澳洲後，上海新娘把這段歷險記告訴了這裡的中國好友。大家都笑彎了腰，誇她：這上海小女子，眞不簡單，隨機應變，太聰明了！

熱愛中國的Dr.Cane夫婦

在工作中，我也結識了不少對中國非常善意和友好的澳洲人。Dr. Cane夫婦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曾於一九七五年在復旦大學教書一年，那時的大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除了正常教課，他們還需參加開門辦學，定期到農村幹農活，摘棉花，割麥子……和農民打成一片。中國改革開放後，他們相繼三次應邀到北大，幫助北大培訓外語師資力量。這些經歷令他們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

Dr. Cane的夫人安娜也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有一次她說起自己有一好友在堪培拉大學教書，每次給新生上課都要先自我介紹：I am Gai。講台下同學們哄堂大笑，鬧得她非常不好意思，因爲她的姓Gai和英文「同性戀」單詞Gay的發音一模一樣。之後她接受教訓，自我介紹時就改稱我是海倫，而不敢再提那個姓了。多麼可憐的Gai姓！安娜歪着半個臉，瞇縫着眼，邊說邊作出悲慘狀，令我們忍不住捧腹大笑。

鑒於對中國的了解和濃厚的感情，Dr. Cane夫婦經常拿起筆，寫一些介紹中國的文章，在澳洲有影響力的英文報刊上發表。他們希望更多的澳洲人到中國看看，親眼目睹這個歷史悠久又生機勃勃的國家。

堪培拉鳥瞰（網上圖片）

永不嫌晚

陳志宏

人生在線

喜歡吃胡老太的辣醬有些年頭了，味兒重，香醇厚，恰到好處。偶看新聞，才知，「胡老太」眞名胡衡芝，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老太。商海沉浮二十載，胡衡芝從退休起念生意經，如今已榮譽載身，富有餘裕。

當年，胡衡芝在萬壽宮商城練攤，家人一萬個不樂意，認爲有穩定的退休工資，掏騰來折騰去，不累呀？好不容易清閒下來，還去吃那苦，何必呢？練攤十年，她收穫滿當，在洪城大市場買下店面，並經營百貨。能在這個市場有一門店，定是南昌生意場上的佼佼者。然而，功成之際，一個華麗轉身，胡衡芝進軍實業，於六十一歲之齡，創辦胡老太辣醬廠。如今，胡老太辣醬是印在南昌人味蕾上的一張金質名片。因之，胡衡芝得以「江西省十大創業先鋒」、「南昌市十大傑出創業女性」和「百姓創業標兵」等榮譽加身。

談及爲什麼搏擊商海，胡老太說：「其實也沒什麼的，只是閒不住，閒下來就悶得慌。」只是爲了不讓自己閒下來，她便想方設法要做點什麼，這一做，成就了千萬財富夢想，金燦燦的夕陽紅爲生命披上華麗的外衣。

做生意，五十起步不算晚，寫小說亦是。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著名作家葉廣芩來南昌參加首屆中國小說節，我與本城幾位作家一道，陪同她在郊外某田園山莊採風。被人問及創作，葉老師坦言：「眞正寫作，我是從四十八歲才開始的。那時，還在醫院做護士，見一病友在床上讀小說，感動得熱淚縱橫，便要來看。讀後便想，這樣的小說我也能寫。」就這樣，她寫開了，憑藉寫小說改變命運，寫成著名作家。葉廣芩寫出《夢裡何曾到謝橋》、《全家福》、《老縣城》和《青木川》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屢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等諸多文學獎項。

葉廣芩對我等小輩說：「作家應該是心靈按摩師，讓讀者在浮躁的氛圍中安靜下來。」應該說，這是一代名家寫作多年所悟到的吧。當然，我們也可以將此理解爲她的成功秘訣。

與葉廣芩相似，美國作家安妮・普露（E.Annie Proulx）亦是後起之秀。

一九三五年，普露在康涅狄格州出生，成年後一直從事新聞採編工作，直到五十歲才開始小說創作。一九九二年，她的小說《明信片》摘得福克納小說獎。次年，長篇小說《船訊》獲得普立茲獎。她爲中國讀者所熟知，是因爲作品被改編成電影。

六十二歲時，她所創作的小說《斷背山》被華人導演李安成功改編，一舉奪得第七十八屆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獎和最佳配樂獎三個獎項。電影讓她聲名鵲起。當被記者問及爲什麼要寫此小說時，安妮・普露說：「我的創作動機是一個愛情故事……我們都渴望知道，有時候對愛會以強大而永恆的方式存在着，並且對誰都有可能。」

善飲學者

司葆華

文化什錦

古來文人好酒，所謂詩酒風流，諸般掌故逸聞被傳爲美談。學者中間也不乏其人，一些知名學者同樣因爲好酒而爲人所津津樂道。

已故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嗜煙酒。說他一生除讀書治學，就以煙酒爲伴了，那是一點都不爲過。煙抽得厲害，酒喝得更兇。年逾古稀，而對杯中物的喜歡不減。由於身體原因，老伴不得已和他約法三章，平時不准喝，客人來時適量喝。籍貫山西的賈先生雖滬上生活多年，可他北方人豪爽好客的性格還是一如既往，交友相當廣泛；加上一生培育桃李無數，家中經常你來我往，高朋滿座。要是哪陣子客人稀疏了，賈先生就孩子般地耍些「小手段」——便私下裡約來客人留飯。

如此一來，既能破了酒戒，還不違背約定。夫人雖一肚子不滿，到底是礙於客人情面，也就由了他，由着他酒杯頻舉，一飲爲快了。弟子們只要寫到賈植芳，這個「酒」字，絕對是繞不過的話題，肯定要大書而特書一番的。他一生歷盡劫波，吃遍苦頭，仍達觀自適，快意恩仇，活得灑脫本眞，學問和人都做到一個很高的境界，不知與這好酒有無干係。

賈植芳的高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陳思和教授也喜歡喝酒。陳教授酒量很好，經常到賈先生家中小酌。喝酒品茗，議論風生，可謂高人雅集。知名評論家張新穎當初跟陳思和做學生時，每每開學返校，家鄉地產白酒是常帶之物，然後師徒兩個肯定會有一番觥籌交錯，推杯換盞了。一次去貴陽開會，席間陳先生和幾位學者喝得一時興起，除消滅了主辦方提供的酒以外，還把張新穎替別人代捎的酒喝個精光。事後再由陳先生補上。陳先生酒後的課，往往別有一番味道，神采飛揚，自由揮灑，口若懸河，妙語連珠，聽的人也如飲佳釀，陶醉不已。

現在陳思和戒酒了。據張新穎說，有一次陳先生喝得多了些，竟至課沒有上好。陳思和爲人嚴謹，頗能自律，從此，這酒便說戒就戒了。

電視主持人的語言與服飾

言　青

如是我見

看電視除了節目內容、形式之外，最先入耳的是主持人的語言，最先入眼的是主持人的服飾。

一般來講，內地各地電視台各種節目的主持人說的都是普通話，中央台、北京台更是如此。令我沒想到的是，一天晚上看完北京台轉播的《新聞聯播》節目後，在預報北京地區天氣時站出了一位帥小伙子，其實他的面孔我早已熟悉，經常與一位女主持人輪流主持這個節目，但這天他的出現讓我眼前一亮。他脫下了以往那套西裝，換上了一件紫紅色的對襟唐裝；一改之前那一板一眼的背稿子式的普通話播音，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話；播音方式也有變化，從嚴肅姿態改爲活潑的體形。

他笑着這面對觀衆：「咱們又見面啦，好啊，您吶（您好）！」一下把我這個老北京給逗樂了，感到很親切。接着聽他說：「昨兒夜嘍（裡），小北風兒一颳，把霧霾給吹散了，您看見沒有，今兒天空奔兒藍（特別藍），溫度雖高了一度，可還奔兒冷（特別冷），您出門兒可別忘了穿上您的羽絨服……」我的丈夫是一個比我還地道的老北京，聽完哈哈大笑說：「這也好，有些節目可以改改語言風格嘛！」

可沒過幾天，我們去公園散步，就從退休的老同事那裡聽到不同意見。一些南方朋友說：「北京電視台那個播天氣預報的小伙子，說北京話太土了，說得又快，我們聽不懂。」一個東北老大姐說：「連我們東北人都不愛聽，我老伴乾脆換了別的台，說聽他一口北京腔，渾身不舒服。」我心想，多好聽的北京話，你們不會欣賞。

後來我又聽了幾次這位小伙子主持人用北京土話播報的北京地區天氣預報，細想想，這些不同意見也並非沒有道理。試想，如果北京人聽上海電視台天氣預報，主持人用上海話播報，北京人肯定是一頭霧水，只能看圖識字了。即使老北京，也只有我們七八十歲的老人聽北京腔覺得親切，八〇後、九〇後的北京年輕人，對北京土腔也不一定習慣，甚至有的聽不懂，因爲他們自小學的就是普通話，連他們的家長也不一定會說純正的北京腔。

我想，媒體的語言要規範，要作爲推廣普通話的典範，如果每個地方電視台主持人都用自己的地方方言播音，那我們的語言不就亂套了。如果電視台要顯示自己的地方特色，還是應讓地方戲曲、曲藝、小品等這類節目盡情地發揮。當然，這是我的一家之見。

從主持人語言想到主持人的服飾。整個數九寒冬，不少文藝節目的女主持人，依然穿着裸露的衣裙，半個上身裸露在外，下半身大腿無遮無掩，讓本來坐在室溫就不高的家裡看電視的人不能不渾身發冷。我認爲，主持人的服裝應合乎時令，裸露衣裙在炎炎夏日也就罷了，在北風呼叫的冬天，這樣的打扮讓人看着很不舒服。主持人的服飾春夏秋冬也應有所不同和變化。這又是我的一家之見。